# 身份、安全与机制：1979 年以来的沙特宗教外交研究*

刘中民　冉启宇

**摘　要：**沙特宗教外交的变迁体现了其从服务于政权合法性构建与国家安全为主，向服务于政治发展、安全保障、国家形象、经济与社会转型等多元功能转变的过程。1979 年以来，沙特宗教外交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大致可以划分为 1979 – 2000 年、2001 – 2010 年、2011 – 2016 年以及 2017 年以来四个发展阶段，其主要任务包括维护国家安全和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修复国家形象，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和服务国家发展转型。沙特宗教外交的变迁受到了多种因素的驱动，“两圣地守护者”的身份追求是宗教外交的价值基础，应对地缘威胁与维护内部稳定是宗教外交的安全诉求，制度与平台建设是宗教外交的机制。沙特的宗教外交既是其确立和巩固地区和国际地位、推动国家发展的核心资产，也是其面临诸多结构性矛盾与风险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沙特阿拉伯　宗教外交　安全机制

**作　者：**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冉启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 一、导论

一般来说，宗教外交是指国家有意识地调动宗教信仰、宗教规范与宗教组织资源，服务于外交理念、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进而实现国家利益的特定外交方式。宗教外交既可以用于塑造国家合法性与国家形象，进而服务于公共外交，也可以在外交实践中作为冲突预防与调停的特殊途径，还可以成为依托宗教认同开展跨国政治动员、拓展地缘影响力的工具。[①] 基于此，沙特的宗教外交可以理解为其以宗教身份塑造国际合法性，依托跨国宗教组织确立和巩固其在伊斯兰世界

* 本文系 2025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当代中东国家对外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5FGJA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宗教外交”的相关研究可参考如下文献：Douglas M. Johnston, *Faith-Based Diplomacy: Bridging the Religious Divide*, Houston: 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ice University, 2009,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2013-08/import/REL-pub-JohnstonFaithBasedDiplomacy-2009.pdf,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18 日；Robert Scott Appleby, *The Ambivalence of the Sacred: Religion, Violence, and Reconcilia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美］路易丝·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李永辉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涂怡超、赵可金：《宗教外交及其运行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2 期；刘中民：《国际关系理论变革视野下的宗教与外交》，《国际观察》2017 年第 4 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领导地位，通过朝觐治理、宗教对话与带有宗教色彩的对外援助等方式，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外交。

沙特长期以政教联盟作为重要合法性来源，即王室与瓦哈比派的结盟：宗教为王朝统治提供合法性，政权则维护瓦哈比教义的正统地位，进而使宗教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之中。[①] “两圣地守护者”的身份，赋予了沙特强大的宗教号召力，而庞大的石油财富与伊斯兰世界宗教领袖身份相结合，使宗教外交不仅成为沙特软实力的体现，更是其参与地区竞争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宗教外交既是沙特塑造合法性、扩大地区影响的重要资源，也因瓦哈比主义及慈善资金与极端主义的关联而长期面临外部质疑。

自立国之日起，沙特便利用宗教开展对外交往，并不断发展。随着 1961 年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和 1962 年穆斯林世界联盟相继成立，沙特开始借助跨国宗教组织，将宗教身份与石油财富转化为对外影响力。通过倡导泛伊斯兰主义和对外援助，沙特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奠定了其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位。但是，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麦加清真寺流血冲突三大事件的冲击，使沙特宗教外交发生重大变化，其突出表现是从维护政治合法性的手段向应对地缘政治博弈、维护国家安全转变，并在此后多次根据内外环境变化进行调整。因此，本文把 1979 年以来沙特宗教外交的历史变迁及其根源和动力作为核心问题进行研究。

学界关于沙特宗教外交的研究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研究沙特宗教外交与地缘政治竞争、安全战略的关系；[②] 第二，研究宗教身份对沙特在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影响；[③] 第三，研究宗教外交与沙特国家转型的关系。[④] 综合来看，尽管国内外学界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连续性有待加强。现有研究或聚焦于冷战时期，或集中于后“9·11”时期，或关注 2016 年以来的国家转型，缺乏长时段的整体研究，难以完整揭示沙特宗教外交的变迁。其次，对国内政治与外交的互动分析不足。现有研究对沙特国内政治与宗教外交的互动未能给予充分分析。最后，对沙特宗教外交复杂性的理解有待深化。现有研究对沙特宗教外交观念、政策、机制缺乏整合研究，未能充分解释沙特宗教外交的根本动因和复杂机理。

因此，本文首先对 1979 年以来的沙特宗教外交进行完整、系统的考察，其基本观点是：1979 年以来的沙特宗教外交可以划分为 1979 – 2000 年、2001 – 2010 年、2011 – 2016 年以及 2017 年以来四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主要任务包括维护国家安全和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修复国家形象，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和服务国家发展转型。在此基础上，本文确立了“身份—安全—机制”这一研究沙特宗教外交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在身份层面解释沙特宗教外交的认同因素，重点考察“两圣地守护者”叙事及其合法性意义。在安全层面重点考察不同时期沙特宗教外交的安全诉求。在机制层面考察沙特利用跨国宗教组织、多边机制、朝觐治理、宗教对话与援助平台等渠道构建的宗教外交路径和手段。总之，身份构成了宗教外交的观念和认同基

---

① 钱学文：《当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社会与文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178 页。

② 相关文献参见：涂怡超：《宗教与沙特外交：战略、机制与行动》，《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 年第 4 期；刘中民：《对“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民主化若干问题的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21 年第 6 期；陈杰：《萨勒曼执政以来沙特的外交转型：志向、政策与手段》，《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 年第 1 期；F. Gregory Gause III，“*Beyond Sectarianism*：*The New Middle East Cold War*，” Brookings Doha Center，*Analysis Paper*，No. 11，2014，https：//www. brookings. edu/wp – content/uploads/2016/06/english – pdf – 1. pdf，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19 日；Simon Mabon，“Existential Threats and Regulating Life：Securitiz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Global Discourse*，Vol. 8，No. 1，2018.

③ 相关文献参见：James Piscatori and Amin Saikal，*Islam Beyond Borders*：*The Umma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pp. 85 – 133；赵跃晨：《沙特阿拉伯的特殊联盟政策：实践、动因和限度》，《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 年第 2 期；李世峻：《二十世纪下半叶沙特民间宗教思潮探析》，《世界宗教研究》2025 年第 5 期。

④ 相关文献参见：唐志超：《由极端到温和：沙特宗教变革及其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23 年第 4 期；孙晓雯、佘纲正：《沙特政教关系变革与社会话语重构》，《国际关系研究》2023 年第 6 期；陈沫：《沙特阿拉伯对外援助的特点、动因与效应》，《西亚非洲》2021 年第 3 期；何思雨：《伊斯兰世界联盟参与全球治理研究》，《西亚非洲》2021 年第 6 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础，为沙特宗教外交提供了国际合法性；安全构成了宗教外交的重要诉求，是沙特宗教外交进行政策调整的核心领域；机制构成了宗教外交的重要手段、路径和平台，是实现沙特国家安全的保障机制。三者共同构成了沙特宗教外交的基础、目标和手段。

## 二、1979 年以来沙特宗教外交的历史演变

根据宗教外交目标与功能的变化，1979 年以来的沙特宗教外交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 （一）以泛伊斯兰团结服务国家安全的宗教外交（1979 – 2000）

1979 年沙特麦加清真寺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等国内外重大事件，共同改变了沙特的安全环境，促使其宗教外交在安全诉求的驱使下由相对低调转向主动出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沙特进一步强化了泛伊斯兰主义外交。[①] 为回应伊朗输出革命对政权合法性的冲击，并进一步巩固其宗教正统性与国际影响力，沙特决定于 1986 年正式将国王的称号更改为“两圣地守护者”，取代了传统的“陛下”。[②] 在国家叙事上，沙特强化了国家政教合一的历史叙事，旨在巩固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③] 在宗教思想传播上，沙特依托“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制局”，大规模印制并对外赠阅《古兰经》。沙特旨在通过官方审定的《古兰经》注释、译本及诵读规范，借助经文传播推广其认可的宗教阐释标准。[④] 为巩固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沙特积极在伊斯兰世界支持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等宗教机构的建设，在欧美等非穆斯林国家建立伊斯兰文化中心。

在地区层面，沙特的主动出击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在多边外交层面，沙特利用其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穆斯林世界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中的主导地位，积极组织逊尼派国家孤立伊朗，抵制其革命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沙特还把麦加朝觐用作孤立伊朗的外交工具。例如，在 1987 年麦加事件导致沙特与伊朗关系破裂后，沙特将伊朗的朝觐名额从原来的约 15 万降至 4.5 万，[⑤] 导致伊朗在 1988 – 1990 年连续抵制朝觐。其次，沙特的宗教外交并非孤立开展，而是与当时更广泛的地区安全竞争相互配合。在两伊战争（1980 – 1988）期间，沙特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战后形成的相关债权据估计约为 250 亿美元；[⑥] 在阿富汗，沙特与美国合作，大力资助和武装“圣战”者组织以对抗苏联。[⑦] 在防务上，沙特深化了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后，沙特宗教外交面临新的挑战，即美军进驻沙特领土引发的宗教合法性争议。因此，沙特利用宗教机构发布“法特瓦”（宗教法令），论证美军进驻沙特的合法性。

总之，1979 – 2000 年的沙特宗教外交以安全诉求为核心驱动力，主要通过泛伊斯兰团结叙

---

① 涂怡超：《宗教与沙特外交：战略、机制与行动》，《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 年第 4 期。

② Saudipedia，“List of Saudi Kings Who Assumed the Title of Custodian of the Two Holy Mosques，” https：//saudipedia. com/en/article/1240/royal – family/kings/list – of – saudi – kings – who – assumed – the – title – of – custodian – of – the – two – holy – mosques，访问时间：2025 年 6 月 15 日。

③ 钱学文：《当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社会与文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177 – 178 页。

④ Saudipedia，“King Fahd Glorious Quran Printing Complex，” https：//saudipedia. com/en/article/450/religion/religious – affairs/king – fahd – glorious – quran – printing – complex，访问时间：2025 年 6 月 16 日。

⑤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Iran Denounces Saudi Restrictions on Moslem Pilgrimage，” May 3，1989，https：//www. upi. com/Archives/1989/05/03/Iran – denounces – Saudi – restrictions – on – Moslem – pilgrimage/7473610171200/，访问时间：2025 年 5 月 8 日。

⑥ Robert Looney，“Bean Counting in Baghdad：Debt，Reparations，Reconstruction，and Resources，”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7，No. 3，2003，p. 66.

⑦ U. 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77 – 1980*，Vol. XII，*Afghanistan*，Document 214，“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Turner to the Chairman of the Speci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February 21，1980，p. 594，https：//history. state. 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77 – 80v12/d214，访问时间：2026 年 8 月 2 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事、跨国宗教组织体系和朝觐治理等，服务于反对伊朗、反对苏联及维护地区主导权的战略目标。尽管海湾战争后安全压力与宗教合法性压力相互叠加，使这一阶段后期的宗教外交更趋复杂，但其以宗教资源回应地缘威胁、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取向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二）以重建国家形象为主的宗教外交（2001 –2010）**

进入 21 世纪，沙特阿拉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001 年“9·11”事件爆发，19 名劫机者中有 15 名为沙特公民的事实使沙特的国际形象跌入谷底，沙美同盟关系也遭遇空前危机。此外，在 2003 年至 2009 年，“基地”组织在沙特本土发动了一系列针对沙特政府和西方目标的恐怖袭击，进而使恐怖主义成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① 同时，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也对沙特构成了严峻挑战。

为应对国际压力，沙特开始有意识地对其国家身份进行重塑。在国内，沙特政府通过官方宗教机构发布权威教令，严厉谴责恐怖主义对伊斯兰教义的扭曲和滥用。在地区问题上，沙特于 2002 年提出了著名的“阿拉伯和平倡议”，主张以“土地换和平”原则解决巴以冲突。该倡议不仅获得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与伊斯兰会议组织的积极支持，更成为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地区和平议程。在国际层面，阿卜杜拉国王积极推动沙特参与反极端主义与跨宗教对话议程。在阿卜杜拉国王的推动下，沙特积极构建“温和、宽容的文明对话倡导者”形象。2008 年，沙特先后在西班牙马德里和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了世界宗教和文明对话会议，旨在向国际社会传递宗教宽容与文明共处的信号，主动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进行“切割”。②

为助力宗教外交，沙特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制度与平台。对内，沙特全面加强对宗教机构的规范化管理。政府对全国数万座清真寺的讲坛实施许可与考核制度，规范讲道内容，修订宗教教材。为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沙特于 2004 年设立了监管对外慈善捐助的专门委员会。③ 此外，政府还建立了专业的去极端化机构，对被捕的极端分子进行心理矫正并实施“社会再融入计划”。④ 沙特还积极利用多边平台推行公共外交。例如，沙特于 2005 年推动伊斯兰会议组织通过了包含打击恐怖主义、促进宗教对话等内容的《十年行动计划》。⑤

总之，2001 –2010 年沙特宗教外交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发起和平倡议、组织宗教对话等方式修复国家形象。

**（三）以应对伊朗威胁为主的宗教外交（2011 –2016）**

2011 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导致阿拉伯国家陷入严重动荡。在此背景下，伊朗地区影响力迅速上升，尤其是 2015 年伊核协议的签署，以及沙特自身与美国龃龉不断，都使沙特陷入了深刻的战略焦虑。在地区政治中，除沙特与伊朗的对抗加剧外，沙特与土耳其围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矛盾也不断加剧。

面对地区动荡和内部压力，沙特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在巴林，沙特于 2011 年以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名义出兵弹压，协助巴林政府稳定局势。在叙利亚，沙特积极援助叙利亚反对派和逊尼派力量，旨在推动亲沙特的逊尼派势力执政。⑥ 在也门，沙特加大了对逊尼派部落和政治派别的支持，并最终于 2015 年组织阿拉伯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为配合地区地缘政治博弈，沙

---

① 包澄章：《多域融合与刚柔并济：阿卜杜拉时期沙特阿拉伯的反恐战略》，《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 年第 6 期。

② 刘中民：《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104 –105 页。

③ Lin Cotterrell and Adele Harmer，“Aid Donorship in the Gulf States，” HPG Background Paper，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September 2005，p. 19，https：//odi. org/documents/1922/414. pdf，访问时间：2025 年 5 月 8 日。

④ 包澄章：《多域融合与刚柔并济：阿卜杜拉时期沙特阿拉伯的反恐战略》，《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 年第 6 期。

⑤ 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Ten-Year Programme of Action to Meet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Muslim Ummah in the 21st Century*，adopted at the Third Extraordinary Session of the Islamic Summit Conference，Makkah al-Mukarramah，December 7 – 8，2005，https：//ww1. oic – oci. org/ex – summit/english/10 – years – plan. htm，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21 日。

⑥ 陈翔：《内战为何演化成代理人战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1 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特借助阿拉伯媒体、宗教人士与公共舆论平台，持续强化伊朗威胁地区稳定和教派冲突的叙事，从而引导地区民众的认知。①

在国际层面，沙特积极进行议题设置和机制建设，增强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为加强对伊斯兰世界反恐合作的领导，沙特依托伊斯兰合作组织（其前身为伊斯兰会议组织，2011 年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多次通过谴责极端主义的决议，推动反恐与反极端主义合作；② 为彰显自身对宗教和文明对话的引领作用，沙特于 2012 年与奥地利、西班牙共同推动成立了“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宗教间与文化对话中心”。③

总之，2011－2016 年沙特宗教外交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教派叙事进行政治动员，服务于对伊朗的地缘竞争。这一时期宗教外交的教派化与工具化特征更为突出，既加剧了地区对抗，也严重消耗了自身的战略资源。

**（四）以国家转型为导向的宗教外交（2017 年以来）**

2015 年萨勒曼国王继位，特别是 2017 年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出任王储后，沙特进入了国家转型时期。沙特于 2016 年推出了“2030 愿景”，其核心是推动经济多元化，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并将沙特打造为全球投资枢纽。为实现这一宏大目标，沙特外交政策也经历了由保守向温和的重大调整。在此背景下，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于 2017 年提出，沙特将“回归 1979 年以前的温和伊斯兰”。④

为配合国家转型，沙特对国家身份和政教关系进行了积极的重塑与再造。首先，在国家叙事层面，沙特官方高调倡导“温和伊斯兰”。在国际媒体的专访中，穆罕默德王储曾反复阐释这一理念。⑤ 其次，在权力结构上，沙特进一步强化了王室对宗教机构的管理，宗教精英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影响力相应减弱。最后，在社会领域，沙特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社会开放，突出表现为大幅削弱宗教警察权力、开放妇女权利，并放松对公共生活的严格宗教管制。这些变化都为沙特的宗教外交转型奠定了基础。

在安全领域，沙特开始从激进对抗转向务实温和。沙特自 2021 年以来数次与伊朗在阿曼、伊拉克举行双边对话，寻求与伊朗缓和关系，并于 2023 年在中国斡旋下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此外，沙特与土耳其围绕穆斯林兄弟会的矛盾也得到解决，双方关系迅速缓和。为推进去极端化，沙特于 2017 年成立了“全球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中心”，⑥ 标志着沙特的去极端化工作从被动防范为主，转向以大数据和跨平台协作为基础的常态化管控。

在宗教外交的机制层面，沙特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对传统的宗教职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首先，在多边议程方面，沙特积极主导国际议程的设置。沙特积极利用伊斯兰合作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多边平台，在巴勒斯坦等关键议题上牵头协调立场。⑦ 2019 年，在萨勒曼国王支持下，穆斯林世界联盟在麦加召开国际会议并发布《麦加宪章》，奠定了“反极端、尊重多元”

---

① 刘中民、赵跃晨：《教派问题安全化形塑中东地区格局——以沙特阿拉伯外交为例》，《国际展望》2020 年第 5 期。

② 转引自唐志超：《由极端到温和：沙特宗教变革及其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23 年第 4 期。

③ King Abdullah Bin Abdulaziz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Interreligious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Dialogue Centre*, Vienna: KAICIID, 2017, https://www.kaiciid.org/sites/default/files/about_kaiciid_for_web_0.pdf,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21 日。

④ 转引自唐志超：《由极端到温和：沙特宗教变革及其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23 年第 4 期。

⑤ Martin Chulov, “I Will Return Saudi Arabia to Moderate Islam, Says Crown Prince,” *The Guardian*, October 24,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oct/24/i－will－return－saudi－arabia－moderate－islam－crown－prince,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20 日；Norah O'Donnell, “Saudi Arabia's Heir to the Throne Talks to 60 Minutes,” *CBS News*, March 19, 2018, https://www.cbsnews.com/news/saudi－crown－prince－talks－to－60－minutes/, 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20 日。

⑥ Global Center for Combating Extremist Ideology (Etidal), “A Year of Moderation,” May 21, 2018, https://etidal.org/en/a－year－of－moderation/, 访问时间：2026 年 8 月 2 日。

⑦ 赵跃晨：《沙特阿拉伯的特殊联盟政策：实践、动因和限度》，《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 年第 2 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价值基调；[①] 此后，穆斯林世界联盟举办了“宗教信仰共同价值论坛”，[②] 进而彰显了沙特在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推进宗教对话方面的作用。其次，在朝觐事务方面，沙特通过推动朝觐管理数字化革命，提升了朝觐管理水平。沙特官方上线的一站式平台，整合了签证、交通、住宿等全流程服务，将朝觐从单纯的宗教活动升级为高水平公共服务。[③] 同时，为缓和与伊朗的关系，沙特恢复了伊朗的朝觐配额。[④] 此外，在人道援助方面，沙特依托“萨勒曼国王人道主义援助与救济中心”，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一系列援助项目，并主动公开数据和报告，[⑤] 极大地提高了沙特对外援助的科学化与透明度。

总之，2017 年以来沙特宗教外交逐步转向服务国家转型，并在改善国家形象和缓和外部环境方面初见成效，但其成功与否仍取决于国内改革的持续推进及国际社会的信任程度。

## 三、沙特宗教外交变迁的动因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现代沙特阿拉伯自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外交政策的特点就是小心谨慎”。[⑥] 总体来看，宗教外交也契合沙特外交的基本特征，总体呈审慎、保守的特点。但历史地来看，沙特的宗教外交仍呈现出阶段性特征。1979 – 2000 年、2011 – 2016 年两个阶段具有较强的进取性和对抗性特征，其原因在于宗教外交主要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地缘政治诉求；2001 – 2010 年、2017 年以来两个阶段具有防御性和温和性的特征，其原因在于宗教外交主要服务于塑造国家形象和国家转型发展。沙特宗教外交的变迁并非单一因素推动的结果，而是身份叙事、威胁认知与制度运作相互作用的产物。

### （一）身份维度的分析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行为不仅受“物质性生存威胁”驱动，还受身份认同的心理需求驱动。沙特国家合法性的基石——“两圣地守护者”的宗教身份便是其本体安全的核心支撑。它既是荣誉，也是沉重的责任与压力。维系和巩固这一身份的连续性，是驱动沙特宗教外交的根本动因之一。

沙特的政权合法性深植于其特定的身份认同。沙特宗教外交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借助宗教话语维护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以及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⑦] 这种关系可以理解为王室与宗教精英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即现代沙特的政治秩序建立在王室与宗教精英的共生关系之上，国家维护与推广宗教，宗教权威赋予王室政治合法性。同时，沙特的外交政策也系统地融入了“乌玛”（穆斯林共同体）的理念，旨在通过强调宗教团结强化其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

但是，沙特对宗教身份的追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为一种动态的叙事建构过程，其具体的侧重点随着其合法性面临的不同挑战而不断调整。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对沙特的身份地

---

① Muslim World League，“The Charter of Makkah，” July 4，2019，https：//themwl. org/en/chartermakkah，访问时间：2025 年 7 月 14 日。

② Muslim World League，“The Forum on ‘Common Values among Religious Followers’ Launched under the Auspice of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May 11，2022，https：//www. themwl. org/en/node/39072，访问时间：2026 年 8 月 2 日。

③ Nusuk Hajj，“Nusuk Hajj-Your Gateway to a Journey of a Lifetime，” https：//hajj. nusuk. sa，访问时间：2025 年 10 月 12 日。

④ Saudi Press Agency，“Ministry of Hajj and Umrah and Iranian Hajj Organization Conduct All Necessary Arrangements for Iranian Pilgrims Participation in Hajj Season 1438，” March 17，2017，https：//www. spa. gov. sa/w355694，访问时间：2026 年 8 月 2 日。

⑤ Saudipedia，“Timeline of the Efforts of King Salman Humanitarian Aid and Relief Center，” https：//saudipedia. com/en/article/4100/government – and – politics/foreign – policy/timeline – of – the – efforts – of – king – salman – humanitarian – aid – and – relief – center，访问时间：2025 年 10 月 12 日。

⑥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 年，第 219 页。

⑦ 涂怡超：《宗教与沙特外交：战略、机制与行动》，《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 年第 4 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位构成了直接的冲击，其表现之一是霍梅尼攻击沙特君主制的合法性，并争夺其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为应对这一挑战，沙特将国王称号正式更改为“两圣地守护者”，其目的在于明确自身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逊尼派世界的正统地位，以回应伊朗对其政权合法性的挑战。

2001 年“9·11”事件后，沙特面临着来自西方盟友的巨大压力，西方将沙特的传统宗教身份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挂钩，甚至认为沙特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构成了滋生极端主义的根源，将沙特形容为“邪恶核心、原动力、最危险的对手”。① 针对西方的指责，沙特展开了积极的公共外交，组织了一系列宗教对话活动。沙特在阐明坚决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主张的同时，反对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挂钩，并倡导宗教与文明对话。②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再次对沙特的政治合法性构成了挑战。面对这一威胁，沙特通过高级学者委员会发布教令，宣布抗议为“非法”，借助宗教权威否定街头抗议的正当性。但是，“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也使沙特认识到经济与社会危机对其政权安全的威胁，进而促使沙特通过国家转型再造国家身份和政治合法性。2016 年“2030 愿景”的提出，标志着沙特国家战略重心已转向通过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改革实现国家转型。在此背景下，沙特官方高调倡导“回归温和伊斯兰”，旨在塑造一个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现代伊斯兰国家的新身份。

**（二）安全维度的分析**

安全层面的分析在于研究沙特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界定核心威胁、对安全议题排序，并据此调整宗教外交的服务目标。借鉴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把某一问题建构为安全威胁）理论可以发现，沙特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特定的话语将不同议题建构为安全威胁，以维护国家安全。③

1979 年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与苏联入侵阿富汗，被沙特视为对其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为应对挑战，沙特宗教外交呈现出显著的工具化特征，并服务于其地缘战略。首先，沙特将支持阿富汗抵抗苏联入侵建构为捍卫伊斯兰世界整体利益的“圣战”，并通过宗教动员树立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沙特不仅为阿富汗提供了大量援助，而且积极进行跨国宗教动员，以赢得伊斯兰世界的道义支持，并与冷战时期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相结合。其次，为对抗伊朗输出革命，沙特一方面支持海湾国家尤其是伊拉克抵制伊朗输出革命，另一方面依托其雄厚的财力与跨国宗教网络，与伊朗争夺伊斯兰世界话语权，巩固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

“9·11”事件严重损害了沙特的国家身份和国家形象，也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促使沙特在重建国家形象的同时，积极应对和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其举措主要包括：首先，动员国家最高宗教机构发布反对恐怖主义的教令，利用宗教权威消解外部的指责；其次，对沙特主导的跨国宗教慈善机构进行全面整顿，切断可疑的资金网络；最后，系统性地修订国内宗教教育的内容。这些举措虽多属国内宗教治理与安全整顿，但通过重组国家对宗教资源的控制方式，有助于实现化解内部安全隐患与修复国际形象的双重目标。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沙特通过强调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对立，对伊朗的地区扩张加以安全化。在实践层面，沙特利用其主导的媒体力量，大力建构和传播教派对立叙事，将地缘政治冲突诠释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争端。总之，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试图通过“什叶派阴谋论”，强化海湾地区的逊尼派同盟，对伊朗和什叶派势力进行打压和孤立。此外，沙特与伊朗还围绕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家展开博弈，进而导致沙特与伊朗的对抗具有阵营化、教派化、代理人化的特点。④

---

① 转引自包澄章：《多域融合与刚柔并济：阿卜杜拉时期沙特阿拉伯的反恐战略》，《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 年第 6 期。

② 刘中民：《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104 页。

③ ［英］巴瑞·布赞、［丹麦］奥利·维夫、［丹麦］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6 页。

④ 刘中民：《中东地区格局的冷战化趋势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18 年第 2 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2016 年以来，沙特进入国家转型时期，其安全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原因在于“2030 愿景”成为国家的核心议题。这既与政治对抗导致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战略透支，并从对抗转向缓和的变化密切相关，也与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域外大国力量多极化密不可分，进而使中东地区国际关系自 2021 年以来出现了缓和的潮流。[①] 这一变化使沙特面临的安全压力大为减轻，进而为其推动发展转型提供了宝贵的外部机遇。因此，沙特得以主动降低安全成本，集中资源致力于国内经济社会转型。在 2023 年沙特与伊朗复交后，伴随双方关系缓和，沙特宗教外交开始转向淡化教派冲突。在此过程中，沙特的官方话语开始刻意淡化教派对立色彩，转而强调包容与对话，并将朝觐等宗教活动作为释放善意、构建互信的外交平台，如恢复伊朗朝觐份额、提升对什叶派朝觐者的服务规格等。这标志着沙特宗教外交日益重视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保障国家转型这一更高层级的战略目标。

**（三）机制维度的分析**

机制建设揭示了沙特宗教外交变迁的制度基础，反映了其国家制度从传统向现代的深刻转型，[②] 即沙特从依赖石油财富的“食利型国家”向强调效率、规则与专业化服务的“发展型国家”艰难过渡的过程。

从机制的动力源看，庞大的石油财富在早期塑造了其宗教外交的机制。从某种程度上说，沙特建立的一系列伊斯兰组织、对伊斯兰国家的对外援助、宗教慈善基金等，构成了沙特传统宗教外交机制的主要形式。但是，“9·11”事件成为沙特宗教外交机制建设的关键转折点，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强大外部压力，迫使沙特重建其宗教外交机制。“9·11”事件后，国际反恐尤其是金融反恐的国际规范促使沙特整肃宗教基金的跨境网络，进而加强了宗教外交的监管机制，[③] 并直接推动沙特严厉整顿宗教慈善体系，催生了相关法律法规。这标志着其宗教外交机制开始注重规范建设，也为宗教外交的升级奠定了制度基础。

2016 年以来，以“2030 愿景”为纲领的国家战略，直接推动了沙特宗教外交的现代机制建设。为了服务经济多元化、吸引国际投资与重塑国家品牌的核心目标，沙特的公共服务机制开始从传统的宗教传播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并突出表现为朝觐治理的数字化平台建设和人道主义援助的专业化运作，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宗教外交服务于经济发展与国家形象建设。

综上所述，身份、安全和机制共同驱动了沙特宗教外交的变迁。身份是沙特宗教外交的认同基础，提供了合法性源泉，并在内外环境的影响下进行调整与重塑；安全是沙特宗教外交最强烈的本体追求，并深受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尤其是安全环境变化的影响；机制是沙特宗教外交为适应环境和形势变化在制度、规范、平台、手段方面进行的适应性或变革性调整。总之，沙特宗教外交的变迁既有内部需求的战略驱动，也离不开外部压力的深刻影响。

## 四、沙特宗教外交的成效评估

沙特凭借其作为“两圣地守护者”的独特优势，始终将宗教资源作为对外战略的核心支柱之一，并通过身份构建、安全战略和机制平台建设等方式构建了一套宗教外交体系。但是，身份叙事内外脱节、宗教议题的过度安全化以及机制转型引发的合法性挑战，也使沙特宗教外交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

① 刘中民：《中东地区体系的转型与重构》，《云大地区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② 郁建兴、秦上人：《制度化：内涵、类型学、生成机制与评价》，《学术月刊》2015 年第 3 期。

③ FATF and MENAFATF,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terrorist financing measures-Saudi Arabia*, *Fourth Round Mutual Evaluation Report*, Paris: FATF, 2018, pp. 82 – 83, 154, 170 – 171, https://www.fatf – gafi.org/content/dam/fatf – gafi/mer/MER – Saudi – Arabia – 2018.pdf, 访问时间：2025 年 10 月 12 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 （一）身份叙事层面的得失

沙特宗教外交的基石在于“两圣地守护者”的独特身份，也是其安全政策和机制建设的根本源泉。沙特成功地将这一国际身份转化为具体的国际影响力。首先，如前所述，沙特对伊斯兰宗教文本的解释和传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① 其次，沙特对伊斯兰世界事务的国际议程具有较强主导能力。例如，在萨勒曼国王支持下，穆斯林世界联盟于 2019 年召开国际会议并发布了《麦加宪章》，强调反对极端主义、尊重宗教与文化多样性等原则。② 此举有助于提升沙特在“温和伊斯兰”议题上的话语影响力。又如，由沙特与奥地利、西班牙推动创立的“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宗教间与文化对话中心”，使沙特在推动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进行对话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也是沙特改善国家形象的重要平台。

然而，沙特身份叙事的最大局限性在于其对外“温和开放”的叙事与国内保守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首先，在宗教自由领域，沙特国内政策与国际叙事之间存在显著落差。近年来，沙特积极倡导“温和伊斯兰”，并在国内围绕弱化宗教精英权力、扩大社会开放、增加妇女权利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其社会保守化程度与其“温和开放”叙事之间仍存在较大的距离。尽管 2016 年沙特通过内阁决议大幅限制宗教警察权限，但政府仍通过普通警察维护宗教行为规范。③ 2019 年颁布的《公共礼仪条例》虽以社会开放为目标，却仍通过对公共场所着装、行为规范及祈祷时段播放的音乐等作出限制，延续了以宗教价值观为基础的公共管控逻辑。④ 此外，沙特虽宣布扩大妇女权利，但同时却在 2022 年的《个人地位法》中要求女性结婚须经男性监护人同意。⑤ 其次，在法律实践层面，沙特高调宣扬的“温和化”与其国内法律实践之间存在明显偏差。2017 年出台的《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及其融资法》对“恐怖犯罪”的定义极为宽泛，将“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国家统一”等情形也涵盖在内，⑥ 在实践中容易压制正当的表达与集会自由。此外，多边人权机构的评价也从外部印证了沙特身份叙事与制度实践之间的落差。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审议沙特合并提交的第十、十一次定期报告时，多次就什叶派等少数群体面临的不平等问题表达了关切。⑦ 总之，沙特国内保守现实与对外温和叙事之间的矛盾，极大地削弱了沙特在推动宗教宽容与对话方面的说服力。

### （二）安全策略层面的成败

在服务国家安全方面，沙特宗教外交在特定时期展现了其作为地缘政治工具的有效性。在短期目标上，沙特曾多次成功通过宗教外交实现其战略意图。例如，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沙特通过将地缘冲突建构为教派矛盾等方式，对伊朗的扩张进行遏制。在战略调整方面，当意识到长期对

---

① Saudipedia，“King Fahd Glorious Quran Printing Complex，” https：//saudipedia. com/en/article/450/religion/religious－affairs/king－fahd－glorious－quran－printing－complex，访问时间：2025 年 7 月 15 日。

② Muslim World League，“*The Charter of Makkah*，” July 4，2019，https：//themwl. org/en/chartermakkah，访问时间：2025 年 7 月 14 日。

③ Reuters，“Saudi Arabia implements public decency code as it opens to tourists，” September 28，2019，https：//www. reuters. com/article/world/saudi－arabia－implements－public－decency－code－as－it－opens－to－tourists－idUSKBN1WD08C，访问时间：2025 年 7 月 15 日。

④ Saudi Tourism Authority，“Violations to Public Decency and Penalties，” https：//cdn－visa. visitsaudi. com/downloads/VIOLATIONSTOPUBLICDECENCYANDPENALTIES. pdf，访问时间：2025 年 7 月 15 日。

⑤ Kingdom of Saudi Arabia，“Personal Status Law，” March 9，2022，https：//fac. gov. sa/en/legislations－posts/personal－status－system/，访问时间：2026 年 9 月 12 日。

⑥ Saudi Central Bank（SAMA），*Law on Combating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Royal Decree No. M/21，November 1，2017，Article 1，https：//rulebook. sama. gov. sa/en/law－combating－financing－terrorism，访问时间：2026 年 8 月 2 日。

⑦ UN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CERD），“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combined 10th and 11th periodic reports of Saudi Arabia，” December 24，2024，https：//docs. un. org/en/cerd/c/sau/co/10－11，访问时间：2025 年 6 月 22 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抗的巨大代价威胁国家发展时，沙特又能果断对其宗教外交进行调整。从 2021 年沙特与伊朗缓和关系到 2023 年双方实现复交，沙特频繁释放缓和教派矛盾的信号，进而使自身安全环境得到改善。由此可见，沙特宗教外交在安全诉求上的温和化，无疑对促进沙特与伊朗复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沙特宗教外交在安全策略上依赖教派矛盾进行地缘政治博弈，为自身和地区带来了长期的风险。这一策略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的多个地区冲突中得到充分体现。沙特以海湾合作委员会“半岛盾牌部队”的名义对巴林民众抗议进行镇压，引起巴林什叶派民众的强烈愤慨。① 国际危机组织指出，巴林政府的镇压和沙特的军事介入可能使一场寻求民主改革的群众运动演变为武装冲突，并加剧巴林及地区的教派紧张，② 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在叙利亚危机中，沙特等海湾国家以教派划线，资助逊尼派的反对派武装，极大地加剧了冲突的教派化进程。2015 年沙特组织阿拉伯联军对什叶派的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战争，不仅严重消耗了沙特的财政储备与军事资源，更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至 2024 年，也门有约 1820 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与保护服务。③ 此外，沙特不仅深陷也门的战争泥潭，其本土目标在 2015 – 2022 年间也遭到胡塞武装数百次跨境打击，④ 直接威胁沙特安全，迫使沙特投入巨资构建昂贵的国土防空网络，这进一步凸显了其教派化安全策略对自身安全的反噬。

**（三）机制建设层面的利弊**

长期以来，沙特建立了一系列宗教外交机制，并体现出一定的环境适应能力。自 1979 年到 20 世纪末，沙特主要依赖穆斯林世界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以及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等泛伊斯兰组织开展宗教外交。⑤“9·11”事件后，沙特通过加强慈善基金监管、设立跨宗教对话中心等措施，主动修复国际形象，开启了沙特宗教外交机制的规范化进程。

当前，沙特宗教外交机制建设的重点是全面服务于“2030 愿景”。首先，在国家形象塑造上，沙特以“温和伊斯兰”话语为主，辅以国内社会开放改革，试图改善国际形象，进而为吸引外资创造有利环境。据沙特投资部报告，2022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同比下降 12%，而沙特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反而同比增长 21%。⑥ 其次，在培育经济新动能方面，沙特正积极对传统宗教职能进行现代改造与经济赋能。当前，朝觐管理的数字化正成为沙特机制创新的核心亮点，⑦ 从而规范了朝觐治理，提高了朝觐服务水平。⑧ 而以“萨勒曼国王人道主义援助和救济中心”为代表的国际援助机构，也提升了沙特对外援助的专业化。

然而，沙特宗教外交机制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在一系列内外危机推动下进行的被动调整。早期沙特宗教外交监管机制不健全，部分慈善资金被质疑与极端主义活动存在关联，并在“9·11”

---

① Reuters，“Saudi Sends Troops to Bahrain；Shi'ites Call It War，” March 15，2011，https：//www. reuters. com/article/us – bahrain – protests – forces/saudi – sends – troops – bahrain – shiites – call – it – war – idUSLDE72D0KH20110315，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22 日。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Popular Protests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III*)：The Bahrain Revolt，Middle East/North Africa Report No. 105，April 6，2011，https：//www. refworld. org/sites/default/files/legacy – pdf/en/2011 – 4/4d9d59642. pdf，访问时间：2026 年 9 月 12 日。

③ United Nations (Yemen)，“Yemen Humanitarian Response Plan 2024，” January 2024，p. 21，https：//yemen. un. org/en/259543 – yemen – humanitarian – response – plan – hrp – 2024 – january – 2024，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22 日。

④ ACLED，“Beyond Riyadh：Houthi Cross-Border Aerial Warfare，2015 – 2022，” 2023，https：//acleddata. com/report/beyond – riyadh – houthi – cross – border – aerial – warfare – 2015 – 2022/，访问时间：2025 年 10 月 9 日。

⑤ 吴冰冰：《从对抗到合作——1979 年以来沙特与伊朗的关系》，《阿拉伯世界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⑥ Ministry of Investment of Saudi Arabia (MISA)，*Saudi Arabi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port*，January 2024，p. 12，https：//misa. gov. sa/app/uploads/2024/04/saudi – arabia – foreign – direct – investment – report – january – 2024. pdf，访问时间：2025 年 10 月 8 日。

⑦ 钮松：《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伊斯兰朝觐活动变迁》，《国际关系研究》2019 年第 3 期。

⑧ Waad Hussain，“Saudi ministers announce full Hajj readiness with 1. 07 million pilgrims already in Kingdom，” Arab News，May 27，2025，https：//www. arabnews. com/node/2602262/saudi – arabia，访问时间：2025 年 10 月 9 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事件后引发了严重的国际信誉危机。沙特随后进行的整顿，虽然在规范管理上取得进展，但又抑制了民间慈善援助的活力。[①] 而 2015 年朝觐期间发生的踩踏悲剧，仍体现了其应急管理能力的不足。[②] 当前，沙特宗教外交机制的核心缺陷在于其内在矛盾。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主导的改革，本质上是将“温和伊斯兰”作为一种服务于经济目标的政治工具，而非源自社会内部或宗教机构自发的变革需求。这种由国家权力强力推动的社会开放，力图削弱教界的宗教权威，其具体措施包括削弱宗教警察的执法权限、[③] 重组宗教机构、加强对清真寺讲道内容的行政管理、拘捕持异议的宗教人士等。这些举措固然为宗教外交的转型奠定了制度根基，但其在国际社会的说服力与公信力依然有限。因此，有分析认为，随着“2030 愿景”的推进和传统财富分配方式的变化，沙特需要寻求新的合法性来源，相关经济社会改革也可能改变王室与宗教精英之间的传统关系。[④] 在此背景下，若改革持续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并进一步削弱传统政教联盟，其潜在社会风险可能随之上升。

总之，沙特宗教外交效能呈现出深刻的二元性。在身份叙事上，其“两圣地守护者”地位虽是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的源泉，却因国内外实践的矛盾而面临信任危机。在安全层面，宗教的安全化虽是沙特达成短期地缘目标的有效工具，但也催生了自身遭反噬的长期风险。在机制转型方面，沙特的宗教外交机制虽然有力促进了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却也动摇了传统合法性的根基，使其面临新旧势力矛盾冲突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的风险。

## 五、结论

纵观沙特宗教外交的历史进程，其本质是对宗教身份与国家利益不断进行平衡的过程。这一历程揭示了其面临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作为“两圣地守护者”，它承载着维护宗教正统性和伊斯兰世界团结的价值使命；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作为一个务实的国家行为体，运用宗教资源服务于地缘政治博弈、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转型等现实目标。这种内在的双重属性，既是其影响力的源泉，也是其脆弱性的根源。

展望未来，沙特宗教外交的成效不仅取决于其资源投入的规模，更取决于其能否成功对多重矛盾进行平衡。这取决于沙特能否通过持续且可信的内部改革，持久兑现其对宗教宽容的承诺，真正弥合其“温和”叙事与现实威权控制之间的差距；也取决于沙特能否在与伊朗等地区力量的复杂互动中，将脆弱的关系缓和转化为可持续的战略稳定；还取决于沙特宗教外交机制转型在推动国家转型的同时，能否有效整合传统政治合法性及其背后社会力量，实现国家传统与现代的有效融合。2026 年 2 月 28 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而沙特作为美国海湾盟友遭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并对沙特与伊朗关系构成了强烈冲击。沙特与伊朗的矛盾再度激化，使沙特宗教外交面对诸多新的挑战，但沙特宗教外交如何进行调整仍需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李华伟）

---

① Nora Derbal, *Charity in Saudi Arabia: Civil Society under Authoritari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82 – 85.

② Reuters, “Death Toll in Saudi Haj Disaster at Least 2, 070—Reuters Tally,” October 29, 2015,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death-toll-in-saudi-haj-disaster-at-least-2070-reuters-tally-idUSKCN0SN2FD/, 访问时间：2025 年 10 月 8 日。

③ Reuters, “Saudi Cabinet Curbs Powers of Religious Police,” April 13, 2016,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saudi-cabinet-curbs-powers-of-religious-police-idUSKCN0XA25J/, 访问时间：2025 年 10 月 11 日。

④ Jane Kinninmont, *Vision 2030 and Saudi Arabia's Social Contract: Austerity and Transformation*, London: Chatham House, July 2017, p. 2,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research/2017-07-20-vision-2030-saudi-kinninmont.pdf, 访问时间：2025 年 10 月 12 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